

颜师古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”考辨

崔富章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论语类”著录“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”，唐颜师古加注曰：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。”南宋以后，围绕《孔子家语》这部书，有疑、信之分。疑其伪者，借颜注以声张，说“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”^①；信其真者，面对颜注，百思不得其解，“颜氏所说含义有些模糊”^②。

传至今天的《孔子家语》四十四篇，基本上就是颜师古所谓“今所有《家语》”，关于这一点，学界无异议。依逻辑推理，颜师古不大可能看到“今所有《家语》”之外的传本，就是说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“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”本，颜师古已经无缘得见，早已失传了。那么他根据什么作出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”这般不留余地的判断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有多种推测。我以为，不劳远求，颜注的底气，就来自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母体——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。“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”^③，也就是说，刘向主持整理国家藏书，每完成定本，并由竹转写于帛，刘向必写报告一篇（当时称“录”，或称“书录”），连同本书，上奏皇帝“御观”。“录”的体例，一是报告整理概况，某书采集若干篇，除复重若干篇，认定若干篇（具列篇目），校订文字若干（举例）等；二是作者生平事迹及本书要旨得失，以期诱导“今上”。试以《列子书录》为例：

天瑞第一	黄帝第二
周穆王第三	仲尼第四（一曰极知）
汤问第五	力命第六
杨朱第七（一曰达生）	说符第八

右新书定著八篇。护左都水使者、光禄大夫臣向言：所校中书《列子》五篇，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，太史书四篇，臣向书六篇，臣参考书二篇，内外书凡二十篇。以校除复重十二篇，定著八篇。中书多，外书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九十一，影印乾隆五十九年浙江刻本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769页。

②李学勤：《孔子家语通解序》，齐鲁书社，2009年，第1页。

③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，第1701页。

少。章乱布在诸篇中。或字误以尽为进，以贤为形，如此者众。及在新书有栈，校讎从中书，已定皆以杀青，书可缮写。列子者，郑人也，与郑缪公同时，盖有道者也。其学本于黄帝、老子，号曰道家。道家者，秉要执本，清虚无为，及其治身接物，务崇不竞，合于六经。而《穆王》、《汤问》二篇，迂诞恢诡，非君子之言也。至于《力命》篇，一推分命；《杨子》之篇，唯贵放逸；二义乖背，不似一家之书，然各有所明，亦有可观者。孝景皇帝时，贵黄老术，此书颇行于世。及后遗落，散在民间，未有传者。且多寓言，与庄周相类，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。谨第录。臣向昧死上。护左都水使者、光禄大夫臣向所校《列子书录》。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。^①

可以想见，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所载《孔子家语书录》，体例亦当如是。颜师古根据书录中著录的篇目校四十四篇本，发觉篇目有异，差池颇多，因此判断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刘向校定本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”。这原是极自然的事，南宋后期有人提升到“真伪”高度，显然是小题大做了。

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失传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受体例所限而删掉了刘向的“录”，我们无法得知刘向整理校定的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的具体篇目。宏观考量，它不可能超出四十四篇，倒是少的可能性更大些，刘向校书，篇卷合一乃是常例。为什么会少？少了哪些篇？北宋末年刊刻《孔氏家语》十卷四十四篇本^②，卷十所载孔安国之孙孔衍上汉成帝书，为我们提供了打开密室之门的钥匙：

臣祖故临淮太守安国，建[逮]仕于孝武皇帝之世，以经学为名，以儒雅为官，赞明道义，见称前朝。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，得古文科斗《尚书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世人莫有能言者，安国为之[改]今文读而训传其义，又撰《孔子家语》。既毕，会值巫蛊事起，遂各废不行于时。然其典雅正实，与世所传者，不可同日而论也。光禄大夫向以为其时所未施之，故《尚书》则不记于《别录》，《论语》则不使名家也。臣窃惜之。且百家章句，无不毕记，况《孔子家语》，古文正实而疑之哉？又戴圣~~皆~~近世小儒，以《曲礼》不足，而乃取《孔子家语》杂乱者，及子思、孟轲、孙卿之书以裨益之，总名曰《礼记》。今尚[向]见其已在《礼记》者，则便除《家语》之本篇，是灭其原而存其末，不亦难乎？臣之愚以为：宜如此为例——皆记录别见。故敢冒昧以闻。^③

①录自浙江书局辑刊《二十二子》本，清光绪二年翻刻世德堂本。

②北宋本今已不存，传世有明末毛晋汲古阁翻刻本、清光绪二十四年刘世珩玉海堂影刻本。下文所引孔衍上书、孔安国叙录，均据玉海堂本。

③此上书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一百八十四引录，则其出于宋刻本无疑。□内两字，据《文献通考》补；“逮”字、“改”字，据《文献通考》改；“尚[向]”字，《文献通考》无，据上下文意校改。

原来是刘向自定标准，凡已见于大、小戴《礼记》各篇，皆从孔安国撰集四十四篇本中删除，瘦身为二十七卷。虽篇目不完，以其自有主张，亦有所遵循，颜师古不以残本目之，而视之为与“今所有《家语》”不同的另一个系统，如此而已。

刘向以本家自居，志在政治，屡上封事，极言异姓之害。成帝为外戚所困，已经无心朝政，“书奏，天子召见向，叹息悲伤其意，谓曰：‘君且休矣，吾将思之。’”^①刘向人生价值的实现，在奉命领校国家藏书，撰集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（刘歆完成）等目录学经典著作，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文献学奠基人。但不知何故，他对孔安国的学术成果，采取排斥态度。整理著录“《尚书》古文经四十六卷五十七篇”，这当然是必要的，但排除孔安国“为之今文读而训传其义”的《尚书传》五十八篇，则后果严重。古文简册不转写为今文，西汉时期已经难以传播。图书被视作古董，失传是迟早的事，除非有特殊机缘，遇适存环境，又不为盗掘破坏者，侥幸例外。《孔子家语》无可取代，刘向则以大、小戴为本，对《家语》施行外科手术，过度治疗，形同残疾。终于在成帝末年，孔家强烈反弹，博士孔衍告御状，打顶级官司，矛头直指刘向。“奏上，天子许之，未即论定，而遇帝崩，向又病亡，遂不果立”^②。考虑到刘向跟成帝的亲密关系，这就算是胜诉了，孔衍上书暨其附件《孔氏家语》四十四篇并孔安国叙录（南宋以后有以为王肃伪作者，下文将予以辨析），被宫廷正规收储，历经动乱而不灭，宋刊《孔氏家语》十卷，正是那场官司中原告文件的整体再现，何其幸哉！《尚书传》五十八篇就没有这么好运了。《古文尚书》，东晋以后，发生真伪之辨。真的什么样？不明白。所谓“伪”《孔传》，能全盘否定吗？流传过程中的附著“层累”，真的能屏蔽其本初的光芒吗？刘向看似小小的失误，为学术界埋下一大隐患。清华简能否驱散迷雾，拨云见日，人们拭目以待。

关于《孔子家语》，特别是卷十所载孔安国叙录（含世谱事迹）、孔衍上书等文献，唐人无以为“伪”者，屡见征引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书类”小序“《古文尚书》者，出孔子壁中”颜师古注：“《家语》云，孔腾字子襄，畏秦法峻急，藏《尚书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于夫子旧堂壁中，而《汉记·尹敏传》云孔鲋所藏。二说不同，未知孰是。”^③注引孔腾藏书壁中事迹，就出自《孔氏家语》卷十孔安国世谱中，其文曰：“子襄名腾……子襄以好经书，博学，畏秦法峻急，乃壁藏其《家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尚书》及《论语》于夫子之旧堂壁中”，这是唯一文献源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失载），颜师古把它与东汉国史《汉记》并列，非同寻常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儒家类”著录“《 讽言》十篇，不知作者，陈人君法度”颜注：“说者引《孔子家语》云孔穿所造，非也。”^④“孔穿所造”，孔安国世谱“子高名

①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，第1963页。

②《孔衍上书》结尾这几句话，应是在成帝驾崩、刘向病亡之后，主管官员归档时所记。

③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第1706、1707页。

④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第1728页。

穿，亦著儒家语十二篇，名曰《諛言》”云云乃是唯一文献源。班注“不知作者”，乃摘自刘向的“录”（载于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）。颜师古既尊重《艺文志》班固原注，又借“说者”口吻引述《孔子家语》世谱文献，亦不失为负责任的态度。这同样证明，他不认为“今所有《家语》”是伪书。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载孔子九世孙孔眞[纂]以功封蓼侯，高祖“六年正月丙午，侯孔眞元年”，司马贞《索隐》引“姚氏案：《孔子家语》云‘子武生子鱼及子文，子文生眞，字子产。’《说文》以‘眞’为‘积聚’字，此作‘纂’，不同”^①。小司马由姚氏转引《孔子家语》云云，孔安国世谱“子产后从高祖，以左司马将军从韩信破楚于垓下，以功封蓼侯，年五十三而卒，谥曰夷侯。长子灭[臧]嗣，官至太常。次子襄，字子士，后名让，为孝惠皇帝博士，迁长沙王太傅，年五十七而卒”之说也是唯一文献源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失载）。《孔子家语》以上记载，既可与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、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相互印证，又足以补正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之缺失错乱^②，其文献可靠性，无庸置疑。颜师古、孔颖达、司马贞、张守节诸家，皆不以“今所有《家语》”为“伪”，一再称引。颜师古引以注《汉书》，孔颖达引以注《春秋左传》，司马贞、张守节引以注《史记》，传承有序，信赖有加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九十一《孔子家语》提要所谓“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”云云，“不能废”是事实，说唐人“知其伪”，则是没有文献支持的想当然之辞，不能成立。

南宋后期，王柏突发异议，以为《家语》是王肃托名所作^③，但他往往称引孔安国叙录中之语为立论之证^④，则他似乎又不以序文为伪。这样的逻辑混乱表明，王柏所见宋本《家语》王肃序与孔安国叙录判然分明，不相混淆^⑤。明正德二年（1507），何孟春注《孔子家语》八卷，卷首载“汉博士孔衍言”云云（即《孔衍上汉成帝书》），次“魏王肃序”（即《孔安国叙录》前半，无后半世谱部分）。何孟春曰：“王肃代安国序。”未举证。清范家相《家语证伪》^⑥卷十一，先“王肃序”，次“孔安国序”（即《孔安国叙录》前半篇），范氏《证伪》云：“此序为王肃所代作，何孟春业已言之。”次“王肃后序”（即《孔安国叙录》后半篇）。汉人著书，书尾叙录，叙世本源流，述本书要旨，司马迁、扬雄、班固皆如是。宋本《孔氏家语》卷十载孔安国叙录和连为一体的孔衍上汉成帝书，总题为“后序”，显然是不明古人著书通例所致。“后序”二字，当为宋人所增，意在

①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899、900页。

②详见拙文《〈孔子世家〉尾段补正》，《孔子研究》待刊。

③胡平生先生已用出土文献为王肃正名（《阜阳双古堆汉简与〈孔子家语〉》，《国学研究》第七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515—545页），则王柏此说已被攻破。

④（宋）王柏：《家语考》，《鲁斋集》卷九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⑤毛氏汲古阁与刘氏玉海堂翻宋刻本《孔氏家语》十卷，王肃序在卷首，孔安国叙录、孔衍上书在卷十之末尾。

⑥（清）范家相：《家语证伪》十一卷，清光绪十五年徐氏刻《铸学斋丛书》本，近年影印辑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中。

与卷首王肃序相呼应，并无大碍，亦无深意。范家相既以孔安国《叙录》之前半篇（范题“孔安国序”）“为王肃所代作”，没有务实的凭据，更缺乏有力的论证；复割裂孔安国《叙录》后半篇世谱部分，改题“王肃后序”，又在《证伪》中指责《世谱》失实。实际上，孔安国叙录所载孔氏世谱事迹，与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、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吻合，《年表》系逐录国家档案，是朝廷论功行赏、颁发丹书铁券之依据，史家加工空间为零。档案级的《世谱》资料，只能是身为孔氏后人的孔安国的记述，是孔安国为《家语》所作叙录的一部分。宋本《孔氏家语》的孔安国叙录，无论从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是可信的。早在唐初，颜师古诸大家屡屡征引，公信力无庸置疑。颜注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”，依刘向《录》所载篇目，考量孔安国《叙录》并孔衍上汉成帝书所显示的历史背景，既不以《汉志》著录的二十七卷本为“残”，也不以传世四十四篇本为“伪”，“非今所有《家语》”六字，乃是最为恰如其分地表达——刘向本不是传世的四十四篇本。

《孔子家语》四十四篇，大、小戴《礼记》与之大体重合者，各有十篇，除重复，恰是十七篇^①。刘向以大、小戴记为本，删除重复的十七篇，余下二十七篇，应该就是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“《孔子家语》二十七卷”了。故孔衍指责刘向“见其已在《礼记》者，则便除《家语》之本篇，是灭其原而存其末也”。其实，十七篇之外，《礼记》截取《家语》小段，融入各篇，至为繁多。以《檀弓》为例，分别辑自《孔子家语·屈节》、《终记》、《正论》、《曲礼子贡问》、《曲礼子夏问》、《曲礼公西赤问》等多篇，总不能反过来硬说这六篇是从《礼记·檀弓》抄得，既然倒置不成，删除则没有“理由”，由它算了。我们说十七篇“大体重合”，也是很无奈的表述，其间随意删节，貌合神离者多矣。此乃后话，需作专题讨论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浙江大学古籍所

①（清）陈士珂：《孔子家语疏证》十卷，清光绪十七年三馀草堂辑刊《湖北丛书》本。